

SHEN MEI
GAN WU YU WEN HUA TOU SHI

审美感悟 与 文化透视

税海模 著

巴蜀书社

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

税海模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税海模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3.9

ISBN 7-80659-505-8

I. 审... II. 税...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3479 号

责任编辑:谢艺波

封面设计:易 阳

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

税海模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部电话(028)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125 字数 380 千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00 册

ISBN 7-80659-505-8/I·180 定价: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川籍学者,魏晋风骨(序)

——略说税海模教授的为人与为文

蓝棣之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而在新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税海模教授活跃在这个时期,他的很多论文都受到学界的注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他都是正直、诚恳的,颇有一点魏晋风骨,有自己的尊严和个性,是一位典型的“川籍学者”。

我与税海模教授在学术上是同代人,他的有见识、有勇气的论文,早已一一拜读过。第一次见面记得是在90年代初,那时他与同在乐山师范学院任教的李向阳教授一起来京光临寒舍。那时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多了,很有几分潇洒,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关于郭沫若的专著,都是一些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再见面已经是2001年的事了,那次我们同在安徽师范大学出席一个学术研讨会。这时的他,头发已经花白,气度俨然,已经是满腹经纶。会上会下,我们比较深入地交换对各种学术问题的看法,谈得相当融洽。2002年他和几位乐山师范学院担任

院、系领导工作的教授来京开会,并抽出时间光临清华园,那次我们也谈得特别高兴,在高兴中彼此都有深入了解。我想我的心是比较向往和羡慕在乐山工作的朋友的,这大概是因为受了苏轼那首赞美嘉州、大渡河、凌云寺的诗的影响。

税海模教授对于郭沫若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于鲁迅也有相当重要的论述,像《郭沫若泛神论本质上是美学》、《论郭沫若与王阳明的直觉认同》、《鲁迅小说:“死火”精神的象征》等这样一些论文,是很引起学术界注意的。在这些论文里,真正做到了如他所提出来的要求那样,并不满足于对革命领袖有关论点的阐释与发挥,而是要求有学术上的原创性,深具永不满足于当下、永远寻求向上发展的精神。

税海模教授恪守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不曲学阿世,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维护学术的尊严和学者人格的独立,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以学术为生命基点,并且在为人、为文两方面身体力行,严于律己,赢得了学界的尊重和佩服。

税海模教授做学问的方法,或许可以叫做反“以论代史”。他在早期的论文里就勇敢地批评过“以论代史”的种种言论。这个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或者说永远也不会成为“历史问题”。从根本上说,做学问无非两种倾向:论从史出,或以论代史。前者是老实的,后者是取巧的;前者默默无闻,后者风头出尽。今天我们正面临一股“以论代史”的教条主义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来读税海模教授反“以论代史”的论著,不仅有知识上的意义,更有方法论的意义,最后还有做人的意义。这也是我要热烈祝贺税海模教授学术论文集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2年9月2日 于清华东楼

于于启蒙直言、审美感悟 与文化透视之间(自序)

——我的二十年学术生涯回眸

—

秦晖在《求索于“主义”与“问题”间》中,曾分析过在“文革”时期靠自学大学课程而考上研究生的“同等学历者”们,说在当时停止高考、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大背景下,“他们的‘自学’,绝对是‘爱智求真’型的……低调点说,是为求知而求知,高调点说,是为追求真理——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高调,在那种环境下,除了‘真理’,你还能追求什么?”^①

“幸”或者“不幸”,我正是这样一个“同等学历者”:1964年读高中二年级时,我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当了新式农民——“知识青年”。当初想得很浪漫,先用锄头蘸着汗水,在大地上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后来,再用笔蘸着墨水,将这种“山乡巨变”写在纸上。

当时满脑子的理想主义，白天劳动，夜晚学《人民日报》，还抽空搜集、整理民歌。然而很快便发现，严峻现实与浪漫理想反差太大！迷茫中乱七八糟地读了大量的书，从《毛泽东选集》、《九评》，到马克思恩格斯两卷集，到西方人文科学著作……当然读得最多的还是中外文学名著。一半为逃避现实的烦恼，一半为寻找现实的答案。

以后我把这段长达 12 年的耕读岁月，戏称为我的“早稻田大学”。这段苦涩生活，之所以要提及，不仅因为新时期恢复高考后，我因此而“跳”过大学，考上了研究生，而且，这段生活还养成了我“用自己的眼光观察现实，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的思维习惯和今后的治学特征。

我是在山东师范大学读的研究生。导师田仲济教授，是前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建国前就写过《抗战文艺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开拓者之一，同时他还是位很有艺术个性的杂文家，1993 年在济南开过全国性的田仲济杂文学术讨论会。我发现，田先生这一代喝“五四”的奶长大的知识分子，往往比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更为开放，更少禁锢。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在后面》中，他就对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中的不少问题提出了直率的批评：“本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史渐渐变为社会主义文学史了，这主要表现为排斥了许多非革命作家于文学史之外……其次是将萌芽的东西写成主体的东西……有意地强调或突出某些作家或某些问题……结果却有违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文学史中常有不可靠的论断或竟是臆断……辗转相抄，可是一查原书，成了皇帝新衣似的笑话。”^②

田先生治学严谨，强调让材料说话，独立思考。在专业课学习

中,他规定我们按部就班地分专题,读第一手资料,读原著,写专题作业。我第一次作业,写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现代文学史上都说,“五四”新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我发觉,如果真正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至少文学革命初期很难这样认定。当时打倒“四人帮”不久,学术界正在“拨乱反正”。反复修改后,这篇作业的一小部分《文学革命性质质疑》,借思想解放的东风,于1981年发表在创刊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当时年轻气盛,说话不知高低,在文章中竟一并批评了文学史研究中“以论代史”的现象。此后,学术空气乍暖还寒,阴晴不定。原计划中拟写的新文学领导思想转变过程系列论文(四篇)之二,发不出去,便没有继续写下去。

论文中所说的“以论代史”,是有所指的。其开风气者即郭沫若。1930年他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明确指出,“我们眼中的所谓文学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改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表征”^③。但是,1949年在《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中,他却这样来论证文学革命的性质:因为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中国新文化和新文艺的性质。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艺,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④。

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在我个人不过是“童言无忌”、不知深浅、敢于直说而已,但是,在一些人看来,则难免是异端。中国有

“文以载道”的久远传统，习惯于以善作真，学术往往意识形态化，即所谓历史就是胜利者回忆过去。所以范文澜和顾准干脆把中国文化称做“史官文化”。由于八股科举考试的训练，更使中国知识分子养成了一种白首穷经，无非“注”“疏”的思维定势：从圣人之言出发，又以圣人之言为归宿，而不敢越雷池半步。遗憾的是，这种“注疏”式的学术思维模式流传至今，仍然没有完全绝迹，各式各样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凡是派”，都是它们的现、当代版。

毕业后分回故乡的师范院校，僻处蜀中，埋头教学，在困惑中沉默了几年。这几年我认真阅读众多的优秀创新论文，发现自己太直、太“傻”。从一些论文的深层逻辑看，其实对好些事，不少人都心知肚明，却绕开忌讳，另立新说。其实，超越政治层面后，着眼于文学、文化本身，即会发现大片学术处女地正等待有识者去开拓、耕耘。从新角度、用新方法研究，往往说得更精彩。多少懂得些写作技巧后，我将有关新文学性质问题的系列论文，缩写为《中国的新文学》，以互补的方式，委婉地表示了我对主流话语的存疑。

世纪之交，百年回首。一时间陈寅恪、顾准、郭沫若、吴晗等前辈学者的学术生涯，成为学术界的聚焦点。这是当代学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寻，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其中，何清涟的“呐喊”，尤其令我惊心：“自五十年代以来……在多次政治运动的暴虐摧残下……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纯粹的‘饭碗集团’。”“但愿我们这一代人在探求前辈学者的晚年心境时，多多少少能悟出学者生命的真谛。惟有将自己对生命的体验熔铸到学术研究中去，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生命才不会有如朝露。”^⑤

何清涟的“当头棒喝”令我自问：我甘心于只是做“饭碗集团”中的一员么？我能不能以生命体验参与时代的学术对话呢？这些

年我的研究重心已转移到郭沫若研究上,便将在该领域中久积于心的一些话,写成《关于创建郭沫若学的思考》等文,呼吁将学术与宣传与意识形态划清界线,保持适当距离;呼吁不同价值判断的研究,均应以不违背常识理性和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⑥我想,上述文章,大概都可以说是我“不经别人的引导”,“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公开”直白,应该可以说是我的一种自我启蒙吧?于是将这些文章编为一辑,名之为“启蒙直言”。

二

读研究生时,我的研究方向是鲁迅研究,毕业论文写的《鲁迅小说思想意义新探》。这又是一篇反“以论代史”之作。陈涌的鲁迅小说研究,是建国后“十七年”间鲁迅小说研究的公认典范。他按照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典分析,解说鲁迅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形象,说鲁迅小说是中国革命的镜子,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动力。我的毕业论文直接与陈涌讨论,在其原来的理论框架中反驳、立论,事倍功半,写出后一时很难问世。不久王富仁的鲁迅小说新论一发表,便将我的论文覆盖得严严实实。后来经刘纳、王富仁先生辗转推荐,其中一部分从个性化审美感悟谈鲁迅小说主题思想丰富性的,才发了出来。从此我知道了审美感悟在

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87年是我学术生涯中值得一提的年份。当时方法热正在中国兴起,流行于西方的种种研究方法被大量介绍进来。我于1986年9月有幸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进修班进修一年。几年来在教学中,有一定积累,也思考了一些问题。现在有机会到北京来,听听学界前沿时贤们讲课,了解他们之所想及其如何想,实实在在机会难得。北京不愧是学术文化中心,八面来风,能让你思考问题的层级迅速提高。几大出版社、书店、图书馆,为你解决问题,提供难得的资料和理论;而且专家学者云集,方法上可以给你及时点拨;还有众多报刊杂志,真写出了好文章,不愁没地方发表。在北京的头几个月,我埋头听讲、读书,接下来便渐渐有了写作、倾诉的冲动。1987年我共发表了论文8篇,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天津社会科学》、《鲁迅研究动态》、《作品与争鸣》、《郭沫若学刊》等杂志上,其中《文学史的审美研究》一文还被《新华文摘》转载。

《文学史的审美研究》,是我对当时学术界方法热的回应。当时我想,不管用什么新方法,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其特质乃是审美。文学不应该只是工具和手段,而应该回归于文学自身。既然如此,那么说千道万,一句话:开展审美研究才是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中心与关键。何况,美作为自由的象征,审美在本质上是使个体与整体、存在与本质、有限与无限在审美活动中获得统一,是人对自由的象征性占有。所以,高尔泰说,审美对人的解放,是“一种象征,一个向导,一个缩影,或者说一种探索,一种准备,一种演习。也是一种表示,表示人类不会停留在当时还貌似强大和永恒的异化状态”^⑦。所以,审美,不仅与人的解放相一致,而且还

可以是人的解放的基础和出发点。在商品大潮席卷神州大地,人们越来越被异化为“经济人”、“单面人”的时下,审美为人们找回精神家园,对人性的回归,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北京进修一年,增进了我的自信心。我于是想,是否可以首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实验,构建一部审美的断代文体史呢?我先后购买、阅读了相当的美学书籍,对相邻艺术门类,美术、音乐、舞蹈、建筑,也时有涉猎。回川后,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我发现,文学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具思想性的,它的强项并不是“纯粹美”,而是“依存美”。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启蒙和革命救亡联系得太紧密,对其进行审美研究,似乎很难勾勒其精髓。因为相当的现当代中国作家(包括鲁迅在内),都没有太多地把心思放在审美上,严峻的历史环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缺少一份“为艺术”的审美心境,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非文学、非艺术成分太多。最后我并未按构想去写一部审美的断代小说史,而是按艺术功能将现当代小说分为娱乐、启蒙、宣教、审美等相互渗透的四大类,梳理其间的兴衰、消长、嬗变的互动过程,给毕业班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中国现当代小说流变轨迹扫描”。在教学和研究中,我都自觉地注意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批评,十多年积累下来,便形成了集子中的第二辑“审美感悟”。

三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及其三本思想史论,我都不只读过一遍。受其“主体论”、“积淀说”、“文化心理结构论”

的影响与启发,我开始尝试着运用文化学的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我选择文化研究,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从文化视角去研究,可以深刻地凸现研究对象的某些本质方面。

在这方面我有深刻的教训和体会。虽然我对陈涌的鲁迅小说研究并不满意,但我总体上仍然在其社会革命论、阶级论的既定研究框架内思考问题,所以事倍功半,效果甚微,就像在喜马拉雅山上野炊,只煮了一锅夹生饭。王富仁的鲁迅小说研究,之所以一举突破了陈涌鲁迅小说研究的既有范式,就在其是从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切入,构建起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比如,从社会批评革命论、阶级论角度审视,陈涌认为鲁迅小说是中国政治革命的镜子,赵太爷是政治革命的对象,阿Q是政治革命的动力。王富仁从文化学研究批评角度切入,则得出鲁迅小说是中国思想革命的镜子的结论,阿Q与赵太爷都是思想革命(改造国民劣根性)对象的结论。王富仁的研究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显然更合乎鲁迅小说的实际。其实,库恩早已指出,所谓科学的进步或革命,就是其所用研究范式的更新。后来我试着从文化学角度审视鲁迅小说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便发现一个有趣的悖论:其实,鲁迅笔下反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却是以传统的感时忧世、经世致用的典型儒者人生态度,来激进地反对儒家礼教——三纲五常的伦理价值规范的。该文写成后很快便在《天津社会科学》上发表出来。

(二)从文化视角去研究,特别有利于解释一些复杂的研究对象。

郭沫若是从乐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乐山师范学院作为郭老故乡的一所高校,理所当然地将郭沫若研究作为其地方特色。

加之乐山有郭沫若研究园地《郭沫若学刊》。我个人的学术重心渐渐地转向了郭沫若研究。但是,郭沫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用单一的社会批评模式,往往将其简单化。比如郭沫若的“多变”:《女神》时期“为艺术”的“高蹈”倾向,到后来倡导“革命文学”时的极端功利主义。从文化视角去看,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互补”、乐山乡土文化中三江汇流、流水随物赋形等所涵养而成的“通脱”文化性格特征,都能对其作出较好的解释。事实上,人创造了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塑造。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墨、法……的种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情感态度,代代相传,都已积淀、内化为人们心灵深处的某种心理遗传基因,暗中无形地牵制着人们的行为处事。所以,当我们从文化学的特殊视角来梳理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时,不难发现,一方面郭沫若一生的多方面成就无不直接间接地受赐于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其失误与不足中也总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郭沫若作出解释,而且还可以将郭沫若作为一个难得的文化“标本”,借以透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正是基于这种思考,1992年我写出了专著《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帮助我在郭沫若研究中取得了更多的发言权。

(三)从文化视角去研究,有助于远距离地对历史学作理性的冷静反思。

自1840年以来,西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即处于“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这时候起,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告别传统,走向现代化。从此以后,中国的所有变革,都无非是在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的种种现代性演进。如果从文化学

角度看,它们又无一不是中西文化的撞击、应对、融合与互渗……中国知识分子在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对经世致用的向往。我认为,研究不同民族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学”,迟早会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门“显学”。因为这乃是困扰了我们民族近200年的一个老大难的“真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学”中,文化研究应该是它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从我最近的一篇论文《郭沫若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选择》和正着手进行的一个课题《郭沫若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应对》中,都可以看出我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视。

这些年“文化”一词有些变味,“酒文化”、“鬼文化”、“竹文化”……据说还有什么“厕所文化”!这种“泛文化”现象,诚然已使文化相当“庸俗化”了。另一方面,学术界中确乎也有某种过分拔高文化的“唯文化论”倾向,仿佛一切中国问题仅仅是文化问题。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现代学”中的重要位置。因为,现代化中首先有一个“人的现代化”问题,即鲁迅所谓的“立人”问题。胡适曾经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现代学”的大视野中进行文化研究,应该能够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从“臣民”心态中走出来,养成公民人格;应该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添砖加瓦,在现代化大系统工程 subsystem——人的精神观念现代化方面,略尽绵薄。

从8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在我的笔耕中占了很大比重,选了其中一些收入第三辑,编为“文化透视”。

四

上述三种方法的交替使用,渐渐开阔了视野,我偶尔也写点宏观性思考的文章。另外,我所在的师范学院培养的主要是未来的中学语文教师。中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忽略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质。要扭转这种弊端,恐怕需要在高等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中大力加强审美鉴赏训练,并作一系列的相应改革。我在省教委曾有过两个有关高等师范文学课程教育改革问题的立项,并写有这方面的一些文章。如今借本书的出版,选择性地将它们编为第四辑“纵横眺望”。

我所工作的学校,是一所内地偏远高校,近年来才由专科升为本科,是我国高校中的“第三世界”。其教师相当长时间里没有科研压力,至今学校也是以教学为主。这里的教师年复一年,教学任务都安排得很满。相当时间里,科研工作几乎是他们的一种自觉自为的自由“创造”。

转瞬间,我研究生毕业20年多了,留校同学在科研上硕果累累,早当上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回头看自己,不由得感慨万分:“身边落下树叶多的岁月,为什么果实却这般稀少?”渐渐地由中年步入晚景,漫漫学术路途中,竟然只留下东一个、西一个的浅浅脚印……

稍感自慰的,是作为一个边缘的学术人,自觉一直生活得很认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只是,四川盆地比起北京、上海来,明显地要迟一两个学术季节——至少在我们这种以教学为主的学校,

总要等京、沪的学术新潮已推出耀眼的学术成果时,这里才有人开始琢磨其中的新门道。这种情况,有点像郭沫若在其自传《反正前后》中所感叹的那样:要等北京学生的请愿运动都退潮了,成都学界才如梦方醒一般开始酝酿请愿。好在同在一片蓝天下,只要认真生活、认真思考,总会慢慢发现一些当代中国的“真问题”,哪怕迟一两个学术季节,个别笔耕也偶有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复印的时候。所以,我还有勇气,“大狗叫,小狗也叫”。

我当然知道,这些文字并非有什么传世价值。我之所以“敝帚自珍”,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本质上,主要是一种精神存在。在这种意义上,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凝结着我20年来学术生涯的相当心血与生命,可以说是我逝去岁月的一座精神的“坟”。从中不仅可以依稀看见,一个无名学术边缘人,默默地彳亍于学术山路中的小小身影,而且,透过其20年来言说,运思方式的某些微妙变化,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代学术环境,乃至整个社会越来越开放、宽容,越来越现代。换句话说,这本小书对于我,只是一种自恋,对于学术界,似乎有可能具有某种见证社会进步的“资料性”价值。有鉴于此,我愿意冒昧地将当年未能发表的一篇习作,作为附录一并收入书中。因为,我觉得作为见证学术环境日趋现代的文学资料,这篇未定稿,很可能更为典型。

注释:

①秦晖《问题与主义》P443,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②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文学史》P541-543,山东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③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6卷,P8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